

陶寺对话石峁 讲述黄河文明的悠久灿烂

本报记者 付明丽



观众欣赏陶寺彩绘龙盘。



石峁遗址出土的双面人面石柱 图片均由山西博物院提供

距今约5000年前，满天星斗般的文明火花向黄河中游聚合，文化碰撞，社会变革，华夏文明在这里绽放。从4300年前开始，黄河中游晋陕大峡谷两岸，河汾之东，陶寺人夯土建都；陕北高原，石峁人砌石筑城。双城隔河遥望，南北呼应，并峙数百年……

近日，“黄河文明的标识——陶寺·石峁的考古揭示”展览亮相山西博物院，陶寺和石峁两大遗址出土文物同场展出，讲述黄河文明的悠久灿烂。此次展览也是石峁遗址正式发掘以来首次大规模展出，石雕、骨簪、陶鹰、玉钺等珍贵文物，为观众揭开了石峁古城的神秘面纱。

尧都陶寺的礼乐之光

“黄河文明的标识”展由山西省文物局、陕西省文物局、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主办，山西博物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考古博物馆）、神木市石峁遗址管理处（石峁遗址博物馆）、临汾市博物馆、延安市文物研究所承办。展览分为“帝尧之都”和“王者圣城”两部分。“帝尧之都”主要展示陶寺遗址出土文物，并以文化相近的临汾下靳墓地和芮城清凉寺墓地文物为辅展。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村，考古发掘面积近300万平方米，是距今4000年前后黄河中游规模最大的都邑性遗址。遗址清理出宫城、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王陵区、礼制建筑区、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等功能区域，发掘墓葬千余座。陶寺遗址的历史年代、地理位置、文化内涵等，与史籍所载的“尧都”吻合，因此学界普遍认为，这里就是帝尧之都。

此次展览展出了陶寺遗址出土的陶器、玉器、石器等精美文物。展厅里，一件彩绘龙盘吸引了很多观众驻足观看。陶盘上的彩绘蟠龙，身体饱满而外张，颇具威严气势。“上古时代的文物有不少呈现龙的形象，到陶寺文化时期，龙真正成为国家形象的代表。彩绘龙盘与一批礼器性质的重器同出于大墓，说明在这个处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的社会中，将龙作为崇拜的图腾。”山西博物院副院长张慧国说。

彩绘龙盘旁边，陈列着一件由泥质灰陶烧制而成的土鼓，器表饰有绳纹、三角纹等纹样。张慧国告诉记者，陶寺墓葬中出土了不少乐器，由特磬、土鼓和鼙（音“駝”）鼓组成的乐器套组，具备了礼仪乐器的功能，是陶寺礼乐文明的重要代表。

展览中还能看到著名的朱书扁壶。在陶片拼成的

扁壶残片上，有两个朱红色的字符，其中一个与甲骨文、金文中的“文”字极其相似。朱书扁壶的出土表明当时社会已经出现早期文字。

精致的玉神面也是颇受观众喜爱的文物。这是一件祭神的礼器，造型典雅，神态安详，玉质莹润，彰显出墓主人不同寻常的尊贵身份。“陶寺玉器是陶寺礼器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用玉制度受到同时期文化影响，其中玉琮、玉璧受到良渚文化影响，玉钺与双孔刀有黄河下游地区的文化因素，玉神面与江汉一带的玉人相似。”张慧国说。

丰富的区域性文化交流是中国早期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推动力。陶寺文化吸纳草原大漠的游牧文化、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农耕文化，在碰撞与交融中，将东西南北的多元文明基因植根于晋南，繁衍出中华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

石峁古城的惊世发现

展览第二部分“王者圣城”主要展示石峁古城文物，并以山西天峰坪东遗址和碧村遗址文物作为石峁古城文化的重要补充，以陕西延安芦山峁遗址文物作为连接陶寺文化和石峁文化的重要节点。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榆林神木市高家堡镇石峁村，地处黄土高原北端的黄河西岸、毛乌素沙漠东南缘，主要遗存为距今4000年左右的石砌城址，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是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代晚期城址，被誉为“石破天惊”的重要考古发现。石峁遗址引发了学术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多元性的再反思，对于探索早期国家形成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走进展厅，记者的目光便被一件高60.3厘米的双面人面石柱所吸引。石柱前后两面都雕刻着人面形象，凸目，高鼻，厚唇，表情威严神秘。这是石峁皇城台出土石雕中的精品，采用了浮雕、圆雕、阴刻等多种技法，其造型体现出多元文化的复合，并对商周青铜器的造型装饰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石峁玉器闻名于世，是河套地区集中出土玉器数量最多、影响最广的遗址，其种类丰富，制作精美，达到了同期文化的最高水平。此次展览展出了石峁遗址出土的牙璋、玉钺等玉器。

“藏玉于墙”是石峁文化极为特殊的现象。在城墙修建过程中，石峁人将玉器嵌入墙体或埋入墙根。专家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贿神”行为，表现了石峁统治者希望城址安稳牢固的强烈愿望，其巫术特征大于礼仪特征。

展厅里的一组骨质口簧也是石峁考古的重要发现。口簧是汉唐铁簧、明清口琴的前身，由簧鞘、簧舌及拉线等组成，通过拨动弹性簧舌发出的基频音及其谐波音来演奏曲调。石峁皇城台共出土20余件骨质口簧，制作于距今约4000年前，是目前国内所见年代最早、数量最多的弦乐器。有学者认为，骨质口簧可能为石峁上层控制周边区域、维持社会稳定和维系区域整体稳定等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

石峁遗址还出土了大型陶鹰、铜镞、卜骨等文物。“其超大型城址、宏大的建筑、复杂的宗教现象、精美的玉器，及其与周边聚落形成的多层次关系，都表明在4000年前，以石峁遗址为中心的河套地区形成了高度复杂的社会文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石峁遗址考古领队孙周勇说。

黄河文明的核心标识

陶寺文化与石峁文化的绝对年代大致吻合，两者隔河相望，南北呼应，既有不同又有联系。

“陶寺与石峁这两大都邑性遗址，除了因地理条件的不同，城址建设存在夯筑与石筑的差异外，在典型器物、筑城规划、城址结构、夯筑技术、用玉制度、彩绘图案、杀戮祭祀、铸铜技术等方面显示出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这种关系远非承前启后、敌我对峙等简单认识能够概括的。”孙周勇说。

此次展览展出了陶寺和石峁遗址出土的部分陶器，面貌相似度很高。“陶寺土鼓、陶铃、扁壶等典型陶器，在石峁遗址所在的陕蒙地区也有发现。”张慧国告诉记者，“陶寺早期流行的炊器以釜灶为主，中期受石峁文化影响突然出现陶鬲，并在晚期逐渐增多。”

以黄河为纽带形成的大河文化，在漫长的碰撞、裂变、融合中，产生了以陶寺和石峁等文化为代表的早期国家文明，推动了中华民族最早共同体的诞生和最初中国的演进历程，奠定了中国社会绵延不断、多元一体的历史发展格局。

“围绕陶寺与石峁这两个代表性遗址来展示那个时代的文化面貌与当时邦国之间的交流、冲突，展现中华文明发展进程，进而打造文明标识，构成了这个展览的主题。”山西博物院馆员、此次展览策展人崔跃忠说。

为了让公众更加深入地了解陶寺和石峁的历史文化内涵，山西博物院围绕展览主题推出了讲座、沙龙、研讨会、研学游等系列活动。



元代朱碧山银槎杯

“你看这大门、石桥、水榭，300多年前古人画中的沧浪亭，和今天我们看到的差不多。”在吴中博物馆不久前开幕的“吴门吾景——明清吴中山水胜景”展上，清代王翬、王锡辰绘制的《沧浪亭图》吸引了不少观众细细欣赏。展览汇聚多位吴门派代表人物的佳作，展现了明清时期秀雅繁华的吴郡风貌。

坐落在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澹台湖边的吴中博物馆，又名“吴文化博物馆”，致力于打造“领先的吴文化展示、研究和学习平台”，今年6月28日正式开馆。博物馆建筑面积1.8万余平方米，一楼主要用于临展、教育和公共服务，二楼设有基本陈列“考古探吴中”和“风雅颂吴中”。

“考古探吴中”以时间为线索，以原吴县地区历年考古发现为主要展陈内容，通过实物展示、场景模拟等方式，梳理了旧石器时代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吴文化及吴文化的起源与勃兴。

走进“考古探吴中”展厅，一件刻划着神秘符号的黑色陶壶引起了笔者注意。“这是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的黑陶刻符瓦耳罐，是国家一级文物。”博物馆讲解员袁炜介绍，它出土于苏州澄湖遗址，器表打磨光滑，外腹部有4个刻划符号，系陶器烧成后用锋利石器刻出。关于这4个刻划符号的解释，学术界众说纷纭。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刻符与汉字有直接的传承关系，但它们应属于良渚文化时期的古文字，与巴蜀文字一样是汉字的先行形态，足以证明太湖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这件春秋时期的楚途盃，也是我馆的镇馆之宝之一。”袁炜说。这件盃出土于苏州枫桥何山东周墓。盃前设夔龙形提梁，前有短曲形龙首流，龙首为双目外突，小圆口，头顶铸出扉棱。两侧辅以蟠虺纹，填以细密的羽状划纹。盃肩部刻有铭文“楚叔之孙途之盃”，说明它是楚国贵族所用器具。

据史料记载，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伍员率兵攻入楚之郢都。根据同一墓葬中出土的其他器物判断，这件楚途盃很可能是吴人掠回的战利品，赐给攻楚的功臣，并于死后陪葬。它见证了吴王攻楚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风雅颂吴中”由“吴风”“吴雅”“吴颂”3个展厅组成，对吴文化进行更为细致全面的解读。“吴风”着重展现吴地风物与古镇古建筑。在展厅墙上，一幅40米的手绘长卷生动描绘了从古至今太湖地区人们的生活场景。有意思的是，按照墙面的标志，把手放置于适当位置，墙上的画面就会动起来。在“吴风”厅的另一侧，通过墙上的玻璃装置，可以闻到梅花、香樟、柑橘、桂花等不同时节的植物香味，从嗅觉上感受吴地的季节流转。

在“吴雅”展厅，琳琅满目的玉器、瓷器、金银器、漆器等展现了江南的富庶与雅致。“你瞧这个银槎杯，是元代著名铸银匠人朱碧山所作，设计精巧，造型奇特，篆刻精细，是难得的工艺珍品。”袁炜介绍道。此银杯为槎（木筏）形，一老人背靠槎尾而坐，仰首东望，长髯飘动，目视远方，神态潇洒。槎身为枯枝杈杈，榫节错落。槎背部有细瘦阴刻铭文“至正乙酉朱碧山造”。

别看这件银槎杯不小，但它是由银片锤揲塑形而成，内里中空，重量较轻，使用起来非常方便。这样一件集精巧与实用为一体的器物，彰显了吴地雅致的生活情趣与高超的手工艺水平。

“吴颂”展厅以融媒体图书馆、展中展、演出空间相融合的形式，讲述吴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发展。展厅中有吴语太湖片的地图展示，按下按钮还能听到不同地区居民讲的方言，让人们了解吴语的发展和变迁有了更具象的了解。

自开馆以来，吴中博物馆举办了工匠研习、学术讲座等活动，并在微信公众号上发起招募，邀请音乐家、曲艺家、手艺人等走进博物馆开展创意活动。关于未来的发展，吴中博物馆馆长陈曾路说：“我们明年的展览计划已基本排定，会有八九个展览，敬请期待。我们将积极进行各种创新，在深耕吴文化的同时，与国内外更多地区合作举办精彩的活动。”



红山文化玉块形龙

杜建坡摄

浑厚圆滑的玉块形龙、线条优美的玉勾云形器、形似笔筒的玉斜口筒形器，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玉出红山——红山文化考古成就展”序厅，3件具有代表性的红山文化玉器映入眼帘。

红山文化是距今约6500—5000年前中国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最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其中，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是迄今所知规模最大的红山文化祭祀遗址及墓葬群，发现了具有礼制雏形的“坛庙冢”祭祀建筑群和独具特色的玉器、陶器。

“玉出红山——红山文化考古成就展”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辽宁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通过160余件

珍贵文物和动画、3D展示等多媒体手段，较为全面地展现了红山文化的基本脉络和独特内涵，揭示了其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展览恰逢牛河梁遗址重启发掘，是红山文化遗址历次重要发现和最新考古成果的集中展示，其中田家沟和半拉山墓地出土文物为首次在辽宁省外展出。

展览第一单元名为“礼重在祭”，分为“筑坛设祭”“女神庙堂”“彩陶祭器”和“雕塑人神”四部分，介绍红山文化祭祀遗址和出土文物。红山文化发现多处祭祀遗址，其中牛河梁遗址内同时建有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墓群，是最高等级的祭祀遗址。此次展览中有多件女神庙出土的泥塑人像残件，此外还有体现熊、鹰等猛兽猛禽特征的动物塑像残件。

展览第二单元“唯玉为葬”包括“积石为冢”“治玉成器”“美石琳琅”“雕刻琢磨”和“灵韵亘古”五部分，重点展示红山文化的积石冢墓以及随葬玉器的形制、材质、工艺和纹饰。红山文化墓葬为积石冢形制，墓内随葬品多为玉器，极少见石器和陶器。展厅里复原了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一号冢中心大墓。这座大墓的主人可能是掌握神权的巫者，随葬玉器7件：头部两侧各放置一玉璧，右胸侧置一勾云形器、一玉箍，右腕套一玉镯，双手各握一玉龟。

作为新石器时代玉礼器的典型代表，红山文化玉器种类繁多、造型丰富，可分为20余种，其中以环、璧、斜口筒形器、勾云形器和动物形器数量最多。玉龙是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玉器，主要有两种形制：一种躯体呈C形，头部似鹿，附长脊；另一种躯体呈球形，头部似猪或熊。此次展览共展示红山文化出土玉龙8件。序厅中的玉块形龙是此类玉器中形体较大、形制规整且唯一雕有牙齿的一件，是辽宁省博物馆久负盛名的珍品。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碧玉C形龙也出现在展厅中，它是已知红山文化玉龙中体型最大的一件，有“中华第一龙”的美誉。此外，观众还能欣赏到精美绝伦的玉龙凤佩，琢磨细致的玉双连璧、玉三连璧，惟妙惟肖的玉鸟、玉鳖、玉蚕、玉蝗等。

第三单元“文明曙光”由“来龙去脉”和“多元交汇”两部分组成，阐释了红山文化对本地区和相邻地区较早文化的传承、吸收、发展以及同时期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广泛交流。

在展览尾厅部分，设置了红山文化考古大事记时间轴和《红山文化》专题纪录片观影区，让观众了解考古发掘历程及前后的故事。

此次展览闭幕时间为2021年1月17日。



清代窑变釉石榴尊

探访吴中博物馆

吴地风雅此中寻

黄翼 文图